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任晓(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连续跃上新台阶。力量配置的变化会直接间接地带来秩序的变化,中国正在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甚至主动引领者,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涵的重要发展和转变,在2015年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加强。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重要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作为重新崛起的大国出现在联合国舞台上,不仅像过去那样再次强调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而且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世界多边合作事业。中国还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很显然,中国在继续发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用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中国更多地缴付联合国会费,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宣布“中国在联合国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二战结束前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千疮百孔,对这

国际规则:从学习者到共同制定者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需要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后劲和动力。我们应该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
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讲话



■ 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6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图 GJ

一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更是将这种必要性显著地推到世人面前。然而,体现为向新兴发展中大国转移更多份额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受阻和原地踏步5年,直至不久前才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

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投行)的倡议,便是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2015年亚投行筹建取得了长足进展,众多亚洲和非亚洲国家纷纷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年底亚投行正式成立,将于明年1月举行开业仪式。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股东资金实力雄厚,中国作为第一大

股东,外汇储备充足,支持力度很大。亚投行的诞生实乃“应运而生”,这个“运”,最重要的是亚洲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发展所提供的可能。亚投行将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能,将与现有机构一起塑造未来的国际规则。

另一重要发展是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成立并开始运作。新开发银行是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个新兴经济体共同建立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金砖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在五个创始成员国间平均分配,实缴比例与亚投行旗鼓相当,同样为20%。它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由新兴经济体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意义非同寻常。新开发银行面临的挑战在于成功开局后如何有效运营,为确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发展规则而积极探索经验。

如果说新开发银行是发展中大国的“重唱”,那么二十国集团(G20)就是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的“合唱”。2016年将由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制订国际规则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中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塑。在2016年峰会筹办过程中,中国将同各方一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中各方智慧,聚合各方力量,落实历届峰会成果,努力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临近年末,在巴黎召开了世界瞩目的气候变化大会,制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规则。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排放大国,中国团队本着负责任、合作精神和建设性态度参与谈判,为推动大会达成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边组织:影响力上升

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5年可称为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元年,中国影响力伴随全球发展议题的升温,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三个具有标志性的大会在今年召开,从目标、资金落实、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等多个层面和角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应对挑战作出了战略规划,基本定调了未来15年全球发展的共同目标和战略框架。

首先,7月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今后15年世界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筹措问题提出了100多项具体措施和建议,包括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切实履行将国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其中0.15%到0.2%专门提供给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承诺。

其次,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将成为全球各国在今后15年的共同发展目标。

最后,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缔约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

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的能见度在2015年显得尤为突出,影响力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国责任感、发展领导力和道义感召力。

就大国责任感而言,中国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上,中国不仅承诺在十三五期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而且在国际上拿出切实行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例如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提出7项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现汇援助。

就发展领导力而言,中国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种国际组织平台,积极推进改善全球不平等的发展环境,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倡导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就道义感召力而言,中国倡导的平等多元的发展理念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鸣。中国力主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方面,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

经济治理:制度话语权大幅提高

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海冰: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呈现增长乏力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特点,在普遍黯淡的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了7.0%、7.0%、6.9%的增长,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比来看依然属于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在面临国内转型压力不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双重不利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依然步履稳健地展开了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新布局,呈现多个亮点。

第一,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实质进展,将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增加,有利于增强人民币的信用和币值稳定,也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第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成立,全球多边开发银行由发达国家绝对掌控的局面被改写,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建设有了新的行为体。美国国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中国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质性提升。

第三,高铁走出国门,“一带

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有序推进。2015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完成了基本布局,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在具体落实上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俄6月签署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第一单。

徐明棋:2015年世界经济领域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积极发挥主导权,提升了制度性话语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5年可以看成是落实这一战略目标的元年。

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开发金融上话语权增强,也标志着全球开发金融结构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IMF决定接纳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不断敦促下,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被搁置5年的IMF改革方案,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二大份额和投票权国家,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得到增强。

值得关注的另一重要进展是中国与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并生效。这

不仅是中国与亚太贸易伙伴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也是中国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AFTA)的重要进展。这对于应对亚太地区各种双边和次区域贸易安排可能产生的碎片化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务实合作态度得到各国积极评价。

2015年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回应和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中国继4月与印尼签署40亿美元高铁合作项目后,12月又与泰国签署高铁合作项目。中国高铁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向外输出中国生产的高铁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高铁合作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网络,实现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

虽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利益取向,争夺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全球化决定了一国无法长期实施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政策,合作共赢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我们今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既要着眼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制度话语权,要在现存国际制度载体中有足够的代表权,在制度重构上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要着眼于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促进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